

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“九五”规划重点课题研究成果

SHANGHAI
TONGSHI
DAO LUN

K295.1
X68a

上海通史

熊月之 / 主 编

第 1 卷

导

论

熊月之 著

上海
人民
出版
社

Shanghai
Renmin
Chubanshe

一 自然环境

上海概况与名称由来

上海是中国的直辖市,地处太平洋西岸,亚洲大陆东沿,长江三角洲东端,南北海岸线中点,精确的地理位置是:北纬 30 度 23 分至 31 度 27 分,东经 120 度 52 分至 121 度 45 分。北濒长江口,南临杭州湾,西部、西北部与江苏的苏州地区相接,西南部与浙江嘉兴地区相接。所辖岛屿有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以及长兴岛、横沙岛等。全市东西长约 100 公里,南北宽约 120 公里,总面积 6340.5 平方公里(其中陆地面积 6218.65 平方公里),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 0.06%。陆海岸线长 172 公里。下辖 15 区,即黄浦、南市、卢湾、徐汇、长宁、静安、普陀、闸北、虹口、杨浦、宝山、闵行、嘉定、金山和浦东新区;5 县,即南汇、奉贤、松江、青浦和崇明。人口 1305.46 万,占全国总人口的 1.1%。全市常住人口为 1457 万,在全国城市中居首位。^[1]

上海市市花为白玉兰,1986 年经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^[2]。白玉兰在上海的气候下,开花特别早,清明节前,它就繁花盛开;花大洁白,开放时朵朵向上。选择白玉兰为上海市花,象征着一种开路先锋、奋发向上的精神。上海市市标图案是以市花白玉兰、沙

船和螺旋桨三者组成的三角形,1990年经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。其图案寓意是:三角图形似轮船的螺旋桨,象征着上海是一座不断前进的城市;图案中心扬帆出海的沙船,是上海港最古老的船舶,它象征着上海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,展示了灿烂辉煌的明天;沙船的背景是迎着早春盛开的白玉兰。

上海之得名,始于名叫“上海浦”的小河。上海浦之名何时形成,不详。在北宋有关文献中,已有此名,其浦位于吴淞江下游南岸,流经日后上海县城一带,旁边另有一条下海浦。1077年(北宋熙宁十年),在秀州十七处酒务中,始见“上海”之名。此酒务在上海浦边,故名“上海务”,是一个管理贸易和税收的机构。南宋咸淳年间(1265—1274年),上海市舶提举司设立,上海镇逐渐繁荣。1292年(元至元二十九年)以上海镇为县治设县,顺理成章地定名上海县。1927年设立上海特别市,1930年改称上海市,市、县分治,上海又成为市名。

与“上海”有关系的别称有“海上”、“上洋”,都源于上海最早的县志明代弘治《上海志》对“上海”的解释:“上海县,称上洋、海上……,其名上海者,地居海之上洋故也。”“地居海之上洋”一语颇为费解,但后来县志多原文照引,“海上”、“上洋”的别称遂流传下来。

上海简称沪、申。“沪”源于“沪渎”。“沪”由“扈”而来,“扈”之本义指一种捕鱼工具。南朝顾野王《舆地志》记载:“插竹列于海中,以绳编之,向岸张两翼,潮上即没,潮落即出,鱼随潮碍竹不得去,名之云扈。”渎者独也,其本义指独自流入大海的江河。沪渎本为河名,指的是吴淞江入海的那一段,其名始见于梁简文帝的《吴郡石像铭》。东晋年间,修“沪渎垒”以御海盗,垒以河而得名。唐朝皮日休诗云:“全吴临巨溟,百里到沪渎。海物竞骈罗,水怪争渗漉。”^[3]说的就是这条河。“申”之得名,源于春申君。春申君名黄歇,是战国时楚国贵族,被楚考烈王封为春申君,封地为吴,都邑在今苏州,上海地区为其封地的一部分。他是著名贤人,与信陵君、平原君、孟尝君齐名,门下

有食客三千。传说黄浦江系他所开凿,故有此名。黄浦江又名黄歇浦、春申浦、春申江、春江、申江,皆由此而来。但是,此说并无确凿依据,迄今未发现宋以前的佐证资料。黄浦江在战国时尚未形成,黄浦之名至宋代才出现。不过,战国时上海西部已经成陆,春申君到自己的领地来巡视,并不是没有可能的。

地利与天时^[4]

如果撇开长江口的几个岛屿,上海辖地大体呈一四边形。在其西部三分之一处,北起江苏太仓,中经嘉定、闵行,南至奉贤划一直线,正好是古海岸线,亦即冈身。在其东部三分之一处,北起盛桥,中经周浦,南迄南汇航头划一直线,正好是唐代兴筑的捍海塘。由北而南的冈身、捍海塘,是上海陆地演变的两条分界线。

所谓冈身,为一地势高亢的狭长地带。据地质学者研究,洪荒时代,上海所在地区经过多次海陆变迁,时而烟波浩淼,时而岩石嶙峋。7000 万年前,因地壳运动,出现东北至西南走向的断裂,岩浆喷涌,经风化侵蚀,形成松江西北部一带的小山丘,日后被称为“云间九峰”。古太湖区原是一个喇叭形的海湾,在江流海潮相互顶托共同作用下,以长江为主的河流所携来的泥沙,不断堆积,且堆积速度超过海面抬升速度,长江南岸沙嘴与杭州湾北岸沙嘴相接合围,太湖与大海被沙嘴隔开,沙嘴的外缘遂成为海岸线。其时,沙嘴外侧的海水既深又清,有大量介壳类动物,汹涌的波涛将近海泥沙与介壳动物的残骸,堆积在沙嘴边缘,年深日久,堆积高度达到最高潮水位的高度,在距今 6000 年以前,形成高高隆起的冈身。冈身共有三条,西面沙冈,中间紫冈,东面竹冈,是不同时期的三条海岸线。冈身总长约 130 公里,各处宽度不一,宽者 8 公里,窄者 2 公里。冈身形成以后,其内侧

亦即西侧大部分地区渐由浅海变成泻湖,再由泻湖淤积成陆,也有一部分成为大小不等的湖泊。

上海地区主要属于以太湖为中心的碟形洼地东缘部分,宛若从东向西倾斜的半个碟子。全区东、北、南三面略微高起,海拔约4—5米;中部黄浦江两岸次之,约4米;西部淀山湖一带最低,仅2.5米。全区最高点为海拔98米的松江天马山。从地貌上看,冈身以西,属于淀泖低地,包括青浦、松江两县大部,金山区北部,以及嘉定区、闵行区、奉贤县的西缘部分,这是一个以青浦、松江腹地为中心的碟形洼地,形如锅底,水系辐辏,港汊纷纭,湖泊众多。冈身及其以东广大地区,包括宝山区、浦东新区、南汇县的全部,嘉定区、闵行区和奉贤县的大部以及市中心区,属于碟缘高地,由滨海平原与贝壳沙堤组合而成。至于崇明、长兴、横沙三岛以及其他刚露出水面的沙洲,成陆历史最晚,属于河口沙洲。上海周围二三十公里以内,地势平坦,从城市发展的环境意义上说,这是一种天然的宝贵财富,特别是跟地势不平的香港、福州、厦门等港口城市相比。它对于码头、仓储、设厂、交通等,都是至关重要的。

上海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,温和湿润,四季分明。冬季常刮干冷的西北风,但严冬不长,一年中冷到摄氏零下5度的日子一般不会超过10天。夏季多吹湿热的东南风,但酷暑不多,超过摄氏37度的日子寥寥无几^[5]。这种冷暖气流的规律交替,使得春天温和,夏天较热,秋天凉爽,冬天较冷。一年四季中,冬夏较长,各占四月,春秋较短,各占两月。夏季的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,带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丰富水汽,经与北方冷空气交锋,产生大量雨水,年降水量1123毫米,年降水日132天。一年中60%的雨量集中在5至9月。炎风暑雨,雨热同季,这使得气候温暖湿润,虽光照略少,年日照时数仅2000—2200小时,但热量丰富,水分充沛,相当有利于农业生产。

特定的气候和地理位置,是上海成为良港的重要条件。在中国

沿海的不冻港口中,上海是最北面的一个。它胜过华北的天津、青岛两个港口,那里在冬天常有浮冰,影响通航。上海的位置距吴淞口40公里,这不算太远也不算太近的距离,在元明时代,对于防御倭寇和海盗,有一定缓冲作用;对于抵御台风的侵袭,也有一定的屏蔽作用。华南各港口在夏秋之际,台风每每对船舶航行构成严重威胁,而在上海,台风虽然每年也会光顾一二次,但大多虎头蛇尾,往往是在粤闽一带逞凶肆虐,到上海便风势减弱,擦肩而过。

当然,气候也是可变的,也有其变化的历史。根据气象、地理学家的研究,中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,发生过四次周期性变化,分别出现四次温暖期和与其相间的寒冷期。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有密切关系。温暖期到来时,中原地区风调雨顺,经济繁荣,政治稳定,文化昌盛。寒冷期到来时,中原多灾,战争多发,人群便向较为温暖的江南迁移。两晋时期和北宋南宋之际,正值第二次和第三次寒冷期,北方多灾害多战乱,大批北人移居江南,促成对江南的开发和经济文化中心南移。所以,上海地区在宋代以后才有比较大的发展,与气候变迁也有一定关系。

地理优势与科技进步

人们都说襟江带海是上海城市的一大地理优势,这话自然没错。需要补充的是,这种优势是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才凸显出来的。

自然资源的价值,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、生产力的发展,随着自然资源被开发的程度而变化的。上海沿海地理的优势,是到了航海技术发展一定程度以后,才逐步显示出来的。古代的渔业,先前主要在内陆的江河湖泊,随着航行技术的发展,才逐渐向海洋进发。沿海人捕鱼,开始时也主要利用潮涨潮落水位变化的规律,拦圩或置

网捕鱼,然后发展到近海,以后逐渐向远海远洋扩展。人类活动的范围,是随着对自然的认识、驾驭程度而扩展的。人类航海技术到15世纪出现全球性的大发展,郑和下西洋,哥伦布航行美洲,再以后是蒸汽机被用于航海。世界的距离在不断缩短,沿海的优势日益明显。沿海,在16世纪以后是城市发展的一大优势,这名词现在听起来很美妙,会使人联想到物产丰饶、高楼林立、万商云集等美丽的图景,但是在16世纪以前,则是与倭寇侵扰、荒滩碱地、狂风恶浪等名词联系在一起的,并不是人们喜欢或向往的地方。

在中国古人眼里,大海是个神秘的地方,遥远的地方,也是危险的地方,可怕的地方。《山海经》里说,炎帝的女儿女媧,“游于东海,溺而不返”,后化为一种名叫精卫的海鸟。可见大海无情,连炎帝的爱女也给淹死了。孔夫子说,“道不行,乘桴浮于海”,其语近乎发誓。子路说,如果那样,他愿随行。孔夫子一听此话,便说子路“好勇过我”。可见大海可怕,连孔夫子也视为畏途。白居易的名句:“忽闻海上有仙山,山在虚无缥缈间。”说明大海之神秘莫测。因此,古人形容大海,除了神秘、遥远、浩淼等词语,便是狂、怒、恶等字眼。“我爱这蓝色的海洋”,“海风吹,海浪摇”,这些大海的颂歌,只有在工业文明兴起以后才可能出现。

大海危险、可怕,沿海自然荒僻冷落。恶水、荒山、盐土,沿海地区在秦汉以前对中原人没有吸引力。断发文身,错臂左衽,食蚌吃蛇,东南沿海居民的这些习俗,在中原人看来,是不通文化的表现。因此,从夏、商、周一直到秦汉时期,上海所在的吴越地区,虽然也有吴王金戈越王剑,但并不是精粹膏腴之地。只是到魏晋以后,随着生产力的发展,科学技术的进步,随着人们治水能力的增强,航海技术的提高,东南沿海地区才逐渐繁盛起来。唐宋以后,随着中国与东南亚、日本等地交往增多,贸易发展,沿海地区的形象逐渐美好起来。“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”的美称应时而生。时至近代,沿海地区成为中

国经济最为发达、文化最为繁荣的地区,与中部、西部形成明显的对比。

在农耕文明格局中,沿海处于边缘地带;在工业文明格局中,沿海处于中心位置。如果把历史演进、经济发展、科技进步、对外交往、文化发展与城市进步几条线索联系起来考察,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间互为因果的关系。

对环境的改造

从古代到近代,上海人民对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,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造,其中最重要的有四大工程。

其一,修筑捍海塘。在全国经济、文化重心向东南转移的大背景下,上海地区在唐代发展很快。唐初承平时期,国家鼓励人民开垦荒地,上海地区居民垦荒范围由冈身内向冈身外扩展。713年(唐开元元年),在冈身向东约30公里的地方,修筑了南北长一百多里、与冈身相平行的捍海塘。这对于抵御咸潮侵蚀、发展农业具有重要意义。由于这一海堤的兴筑,在距今1200年以前,今上海市区除杨树浦东端和复兴岛等处以外的广大地区,逐渐被改造成成为鱼米之乡。

其二,治理吴淞江。元代以前,吴淞江水面辽阔,号称一江可敌千浦,是上海地区水利命脉。进入元代以后,久居漠北的蒙古、色目官员,不谙江南水情,放任豪强占据湖洲港汊,封土为田,致使此前逐渐完善的水利系统被破坏殆尽。吴淞江渐为淤沙淤浅变窄,一遇大水,横溢为灾。1282年、1286年、1288年连续三次大水,使富饶的杭嘉湖平原,竟然饿殍遍野,甚至鬻妻女易食。1293年,政府采纳上海人潘应武治水方案,在吴淞江上游开港浚浦,疏通水道。自1304年至1326年,又任用著名水利专家、青龙镇人任仁发四次疏浚吴淞江,

使水患大为减轻,这对于日后上海地区持续稳定地发展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。

其三,接黄浦江通流入海。14世纪末期,吴淞江下游一百三十余里长的一段,潮汐壅障,菱芦丛生,严重淤塞,黄浦江在今外白渡桥以北与吴淞江合流,这样,水无所归,时常泛滥成灾。1403年(明永乐元年),主持治河的尚书夏原吉采纳华亭人叶宗行的建议,征用民工二十余万,疏浚范家浜,接黄浦江通流入海。江浦合流,水源充足,冲刷泥沙,使其不易淤积,成功地解决了吴淞江水患问题。范家浜所在即今外白渡桥至复兴岛的一段。这样,大船由海可直接驶至上海县城,奠定了上海良港的基础。到明中叶,黄浦江的地位便超过了吴淞江。明中叶以后,上海逐渐形成内河航运、长江航运、沿海北洋航运、沿海南洋航运和海外航运五条航线,使上海襟江带海的自然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,这对日后上海的崛起有重要的意义。

其四,黄浦江水道疏浚工程。19世纪70年代以后,科技发达,轮船更新,80年代至90年代,长江、沿海轮船逐步大型化,2000—3000吨大船已经频繁地航行于江海之中。这些船吨位大,吃水深,对河道要求相对较高。80年代,外国船只的平均吃水深度已达20英尺,而这时黄浦江却日益淤浅。在19世纪40年代,吴淞口内外沙大潮低水位水深为17至24英尺,到90年代,水深只有9至15英尺,船舶吃水深度与河道淤浅的矛盾日益突出。在中外共同努力下,自1906年至1920年,上海对黄浦江水道进行疏浚,在吴淞口岸构筑导堤、顺堤,用挖泥船开挖帆船航道,束窄航道,加深河床,利用潮力自然冲刷作用,使黄浦江航道稳定地保持一定深度。到1921年,在黄浦江中心处,低水位时水深达到26至28英尺。这对于保持上海港良港地位,有相当重大的意义。

这四大工程,既与上海人民休养生息的土地有关,又与上海城市繁荣兴旺的航道港口有关。上海人民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,改造了

自然环境,营造了较为优越的生存空间。

【注 释】

- [1] 上海年鉴编纂委员会编:《上海年鉴》,上海年鉴社 1998 年版,第 41、42 页。
- [2] 上海特别市社会局曾于 1929 年 4 月以莲花、月季、天竺为候选,交市长择定其中之一为市花。市政府以事涉全体市民,乃在市民中征求意见。评选结果,出乎意外,在 17000 张选票中,棉花以 5496 票当选。当选理由:棉花为农产品中主要产品之一,花颇美观,结实结絮,为工业制造原料,利被民生。上海土壤,宜于种棉,棉花贸易,尤为出口之大宗。当时上海正在改良植棉事业,扩大纺织经营,以棉花为市花,以示提倡,俾冀农工商业,日趋发展,达到解除经济压迫之目的。
- [3] 皮日休:《吴中苦雨》。
- [4] 本节所用数据,均为 1997 年数据,见上海年鉴编纂委员会编:《上海年鉴》,上海年鉴社 1998 年版。
- [5] 近些年由于厄尔尼诺现象,夏天气温有升高的趋势。

二 上海在中国与世界的地位

上海在不同时期的中国,地位很不相同。在古代,从先秦至唐宋时期,她从边缘逐步走向中心;从元代至清代,处于繁盛之区。在近代,她是中国特大城市,最大港口,对外交往基地,近代化起步最早、程度最高,是多功能经济中心,也是全国文化中心之一。1949年以后,她依然是中国特大城市,是中国工业基地、财政支柱,20世纪90年代处于改革开放前沿。

古代上海在中国的地位

古代上海在中国的地位,分两个阶段讨论,一是从先秦至唐宋,二是从元至清。

先秦至唐宋:从边缘走向中心

以城市历史而论,上海地区虽然开发很早,6000年前已有先民生活,但设立独立的行政建置并不算早。在唐代以前,在中国数以百计的城市中,在形形色色的州名、府名、郡名、县名中,人们还找不到

“上海”。以社会综合发展程度而论,春秋以降,秦汉以前,中国政治大舞台在中原一带,春秋五霸,战国七雄,楚汉之争,主战场都在中原。社会、经济、文化重心也在黄河流域。约战国时写成的《禹贡》,将天下分为九州,将九州土壤分为九等,今陕西、甘肃一带的雍州最为肥沃,列上上等,为第一等;山东、苏北一带的徐州列上中等,为第二等;今上海地区所在的扬州列下下等,为最差的一等,所标土壤种类为“涂泥”,意为土湿如泥。古时排水与灌溉技术不发达,先民无法有效利用沼泽地带的粘质湿土,故认为这种土壤肥力最为低劣。战国时期全国有较为著名的经济都会 26 个,其中 22 个在黄河流域,如长安、咸阳、洛阳等^[1],长江以南仅有姑苏等 4 个。春秋战国时期,中国文化繁盛一时,诸子崛起,百家争鸣,但是,从老庄、孔孟到申韩,其代表人物主要集中在鲁、齐、楚、魏等地。据研究,春秋战国时期,儒、道、法、名、阴阳五家,共有代表人物 124 人,其中鲁国最多, 46 人,其次是齐、楚、魏、卫,各有 10 人至 18 人不等,今上海地区所属的吴国排在第十位,也是倒数第二位,仅有 2 人^[2],占总数的 1.61%。

在两汉以前的文献中,没有关于今上海地区居民特点的资料,我们无法知道那时上海地区的人与苏州、会稽人有多少差别。但是,在全国范围内,吴越人的特点,应该就是上海地区人的特点。概括起来,这些特点有:

其一,物质生活不贫不富。先秦时期,吴越与中原相比,地广人稀,雨水充沛,气候潮湿,居民火耕水耨,食鱼与稻,衣麻与葛。在司马迁的笔下,这里既无冻饿之人,亦无千金之家,不算贫瘠,也不富庶。

其二,男少于女。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均谓“江南卑湿,丈夫早夭”,男女人口比例为 2:5,人的寿命也比中原人短。

其三,信鬼神,好淫祀,断发文身。断发,即短发,椎髻,不戴帽

子。这可能与气候湿热、适应泅水与水田劳动有关。文身,在身上刺刻龙蛇图案,这与对龙蛇的图腾崇拜有关。此俗古已有之,根深蒂固,西周建立之前已经存在,日后成为吴国始祖的泰伯从中原来到江南,也不得不入境随俗,断发文身。这一风俗到战国时还存在,《战国策》等书多有述及,其消失时间应在汉以后。信鬼神,好淫祀,是海滨之人普遍习俗。狂风骇浪,变幻无常,猛兽毒蛇,出没不定,信鬼拜神是人们寄托平安心愿的方式。

吴越人衣着习惯与中原人也不一样。中原人峨冠博带,宽袍大袖,右衽;吴越人则紧身短衣,袖口窄小,左衽。吴越人在中原人眼里,非夷即蛮,不通文化,往往不屑一顾。

其四,习武好斗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:吴越之君皆勇,“故其民至今好用剑,轻死而易发”。从春秋到六朝,这里涌现过许多战将、斗士、剑客。民间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,事类讲武。“吴好剑客而士多创瘢,楚好细腰而国多馁死。”这句形容风俗因地而异的话,道出了吴人习武好斗的特点。

在先秦时期,今上海地区有人居住的地方主要在青浦、松江、金山一带,其地在吴越境内,更为靠海、偏僻、潮湿,以理推之,其人较之姑苏、会稽等处,可能更稀少,更野,更好斗。

总的说来,在先秦时期,今上海地区及其所在的江南地区,在中国的文化版图上,处于边缘地带。

西汉以后,江南地区农业不断发展,火耕水耨渐为犁耕代替。三国东吴对江南的经营,使这一带“谷帛如山,稻田沃野,民无饥岁”^[3]。顾雍先后被封娄县令和丞相,陆逊先后被封华亭侯、娄县侯、丞相,顾氏、陆氏家族的兴盛,对于上海地区的发展有重要意义。西晋末年的“永嘉之乱”,引起人口大迁移,齐鲁流民纷纷渡江,江南地区发展迅速,建康(今南京)、广陵(今扬州)、京口(今镇江)、山阴(今绍兴)成为繁华都会,大片卑湿之地变成良田。南朝时的江南,“良畴美柘,畦畎

相望,连宇高薨,阡陌如绣”。^[4]

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向东南倾斜的同时,东南文化也相应有所发展。两汉时期,中国文化重心仍在黄河流域。东汉时各州共有儒生、文士 66 人,排在前五位的是兖州、司隶、豫州、青州、益州,吴郡、会稽所在的扬州,与荆州并列第六,有 6 名儒生、文士^[5],占总数的 9.09%,名次虽仍靠后,但比重较先秦时已有增加。东晋、南朝时,东南文化发展迅速,江浙学风大盛,建康成为全国学术中心,长江三角洲出现了东阳(今金华)、会稽、钱塘、京口、吴兴、吴县、晋陵(今武进)等一批学风繁盛之地。

江南一带民风也由好武逐渐转向尚文。刘邦在分封诸王时,考虑到江南吴越民风轻悍,恐幼子到那里难以控制局面,乃封侄刘濞为吴王。没想到刘濞到了轻悍之地以后也悍了起来,竟然自立为帝,造起反来。到了六朝时,江南风气已与西汉时大不一样,儒生往往宽衣博带,崇文尚雅,甚至熏衣剃面,傅粉施朱。《世说新语》等书对此有生动记载。这种风气的变化,与江南地区生产力的发展,生活比较富庶安逸有关,与中国南北政治势力消长也有很大关系。孙吴被灭亡以后,江南士人被视为“亡国之余”,在政治权益、社会门第方面受到北方士族严厉钳制,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隋朝建立。在北方士族的压制下,南方士族虽屡起抗争,但均以失败告终,最后不得不选择退隐之路。于是,崇尚武力的价值取向渐为江南士族所摒弃,淡泊隐逸之风开始滋生蔓延,温文儒雅成为新的价值取向。^[6]

唐朝是中国南北经济、文化比重变化的关键朝代,也是上海地区发展史上的关键朝代。从唐朝开国到开元盛世,全国经济文化仍是北重于南。安史之乱以后,继以藩镇割据,南北经济比重一变而为南重于北。韩愈“赋出天下而江南居什九”的说法,虽然有些夸张,但中唐以后,军国费用主要出于江南则是不争的事实。与此相一致,江南在文化方面也有了长足发展。据对《新唐书》所载儒生、文士的统计、

分析,唐代有儒生、文士 120 人,其中河北道 33 人,居第一,今上海地区所在的江南道紧随其后,32 人,占总数四分之一强,其余河南、河东、山南等八道,都远远落在后面^[7]。晚唐时期,长江三角洲已成为全国经济、文化相当发达的地区。751 年(唐天宝十年),华亭县设立,这是上海地区第一个独立行政建置。设县本身也是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反映。

五代和北宋时期,上海地区继续发展,北宋初年华亭户数是唐代的 4 倍以上。北宋末年,靖康之难发生,金灭北宋,翌年南宋政权建立,不久南迁,定都临安(今杭州)。南宋政权偏安东南,中原人民纷纷南下。政府对这些移民给予优惠政策,允许他们开垦滩涂,种粮植棉,免除 3 年租税,这对东南地区社会、经济、文化发展影响极大。从此以后,中国经济、文化重心移到了江南,特别是江浙一带。

从元至清:处于繁盛之区

从元代到清代,上海地区都处于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繁盛之区。元代只有九十多年,但在上海历史上,却有至关重要的意义。其一是行政设置升级,华亭县升为华亭府(后改松江府);二是设立上海县;三是在上海设立市舶司,为东南四大市舶司之一。元代上海地区社会经济稳定发展,盐业、棉纺业全国闻名,元初上海地区人口已超过 120 万。

明清时,上海地区是全国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。棉纺织业发展迅速,松江府成为全国棉纺织手工业中心。上海布匹不但享誉国内,上贡宫廷,而且远销海外,赢得“衣被天下”的美誉。航运业有一定发展。明中叶以后,上海逐渐形成内河航运、长江航运、沿海北洋航运、沿海南洋航运和海外航运五条航线,襟江带海的自然优势得到了充

分的发挥。上海地区城市化有了很大发展。上海县城日趋繁荣,街道纵横,店肆林立,万商辐辏,百货毕集,人称“小苏州”。上海地区的集镇繁衍迅速。到明末,上海地区至少有镇市 82 个。由于富庶,上海地区是全国赋役最重的地区。明洪武年间,上海地区赋粮是全国平均数的 7 倍,是北方的 12 倍。1578 年(明万历六年),松江府每亩征赋粮额竟是北直隶府州平均数的 23 倍。

明清两代,上海地区在江苏乃至全国的文化中,都占有重要地位。我们无法统计那时上海人的识字率,也无法确知那时县学、书院、私塾学生总的情况,但从那时衡量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科举考试的情况,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。据不完全统计,松江一府在明代共出进士 561 名,占江苏全省六分之一,在全国府郡中排名第十二位,如果加上嘉定、崇明等县的数字,则位次还可前移。当时江苏进士数在全国排名第二。由此可见,松江进士在全国所占比例是比较高的。华亭董氏家族,在明代天顺至万历的一百六十余年中,出了 8 个进士,6 个举人。南翔一镇,在明代出了 10 个进士,16 个举人。可见科甲之盛。清初,上海地区文士受到奏销案等打击,科甲人数锐减,以后虽有回升,但幅度不大。清代松江府共有进士 229 名,比明代减少一半以上。明清两代,上海地区共出 7 名状元,明代 3 名,清代 4 名。这种 3 年才出一个的稀贵人物,上海地区能有 7 名,密度是相当高的。

近代上海在中国的地位

近代上海在中国的地位,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:全国特大城市,最大港口,对外交往基地,近代化起步最早、程度最高,多功能经济中心,全国文化中心之一。

特大城市

按照施坚雅的研究^[8],1843年中国有1万人口以上的城市292个,排在前十名的依次是:1.北京,2.苏州,3.广州,4.武汉,5.杭州,6.成都,7.福州,8.西安,9.南京,10.长沙。上海排名第12,第11名是天津。北京最大,有85万人,上海仅20多万。到1900年,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时,上海城市人口超过100万,跃居第一。以后,上海一直是中国第一大城市。1919年中国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69个,前10名依次是^[9]:1.上海,2.广州,3.天津,4.北京,5.杭州,6.福州,7.苏州,8.重庆,9.香港,10.成都。这时,上海人口已有240万,比第2名广州(160万)多80万,比第3名天津(90万)多150万,超过后4名即苏州(60万)、重庆(52.5万)、香港(52.5万)、成都(50万)四个城市人口总和。因此,从20世纪开始,上海通常被称为中国特大城市或超大城市。

不光是人口,上海综合经济实力也在中国城市中居于首位。近代和建国以后30年中上海经济在全国的比重,长期居于首位(参见本章有关内容),1978年以后的十来年中略有下降,90年代以后又回升上去。1992年,国家统计局、国家体改委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8个部门对中国187个地级以上的城市进行综合实力和发展水平评估,经过科学的定量分析,上海城市综合实力为全国之首,在全国104项评价指标中,上海有34项名列前茅^[10]。到本书截止的1997年,上海在全国,人口占1.1%,国内生产总值占4.5%,港口吞吐量占18.7%,报纸出版量占10.0%,杂志出版量占6.6%,在校大学生数占4.9%。^[11]

近代化起步最早、程度最高

近代上海城市重心由南向北转移的过程,便是近代城市建设的